

城市音乐景观

CHENG SHI YIN YUE JING GUAN

汤亚汀 著



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CONSERVATORY OF MUSIC PRESS

上海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课题
上海市教委第四期重点学科项目

城市音乐景观

CHENG SHI YIN YUE JING GUAN

汤亚汀 著



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CONSERVATORY OF MUSIC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城市音乐景观/汤亚汀著. —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2005. 8

ISBN 7-80692-180-X

I. 城… II. 汤… III. 城市-音乐-文化-研究 IV. J6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96811 号

- 书 名 城市音乐景观
著 者 汤亚汀
责任编辑 洛 秦
特约编辑 朱 霞
封面设计 徐 颖
责任校对 谢轩江
电脑制作 王雅敏
出版发行 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汾阳路 20 号
邮 编 200031
电 话 021-64315769 64319166
传 真 021-64710490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苏通州市印刷总厂有限公司
字 数 130 千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5.5
版 次 2005 年 8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100
书 号 ISBN 7-80692-180-X/J·173
定 价 18.00 元

目 录

序 言 洛秦	1
第一章 引言 现实背景与学术背景	3
第二章 城市音乐生活的多元景观	22
第三章 音乐生活时空的流动景观	35
第四章 音乐生活的技术——传媒景观	49
第五章 音乐生活的经济景观	63
第六章 音乐生活的意识形态景观	80
第七章 音乐生活中人的景观	98

116	第八章 代结语 多景观的联动与互动： 上海城市多元音乐文化的重建
131	参考书目
138	附录：城市音乐生活个案研究
138	一、英国东北部的民间音乐生活
151	二、上海犹太难民社区的音乐生活

序 言

XU YAN

洛 秦

什么是城市音乐文化？

首先，城市音乐文化是在城市这个特定的地域、社会和经济范围内发生的。其次，城市音乐文化是人们将精神、思想和感情物化为声音载体，它所体现的是音乐特性，而不是城市文化中的其他媒介。再是，城市音乐文化是以声音这个载体体现为教化的、审美的、商业的功能作为手段，从而来加强、规范和促进城市生活中人们的意识形态、社会行为和消费方式。同时，城市音乐文化是以组织化、职业化、经营化的方式来进行的。最终，城市音乐文化是实现对人类文明的继承和发展的一个文化现象。^[1]

城市音乐文化活动自有了城市的出现便随之而产生，但是将它作为一个学科领域来认识和研究是近年来人们对于音乐的内涵与外延理解的深化与扩展的结果。原先音乐人类学的“田野工作”大多在生产力低下的偏僻乡村、经济状况落后的边缘部落进行，一方面是因为西方学者主要关注“他者”文化，另一方面是由于在那里保留着较少被现代化“腐蚀”的原生态音乐。随着学科自身的发展，音乐人类学不仅研究当代存活着的音乐生活，也关注音乐在历史传统中的文化现象；它不仅探究包括西方社会在内的各类民族民间音乐活动，也思考西方古典音乐中的文化本质；同时，音乐人类学的“田野工作”范围不再是狭义的偏僻边缘的乡村部落，而是扩展到更广泛的整个人类音乐活动场景，无疑包括了我们身边的城市音乐文化的内容。

在音乐学研究领域，最早将城市音乐文化研究作为一个学科领域提出的是著名的美国学者耐特尔(Nettl)，他在《八城市音乐文化：传统与变化》(1978年)中对现代化城市音乐文化所面对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批评，诸如现代城市中传统音乐文化的命运、西方化城市生活中传统音乐文化的作用、传统与西方音乐文化的相互影响、不同社会阶层的音乐关注类型、城市中的音乐文化教育，以及城市音乐生活、音乐产品、音乐生产、音乐消费和音乐行为等。

与其说耐特所提出的问题是音乐人类学研究的新视角,不如说它们是人类城市化现象带给我们大家来思考的音乐文化在新的生存环境中所面临的新挑战和新命题。

在这里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汤亚汀先生《城市音乐文化景观》的出版,该著作正是针对城市音乐文化面临新挑战和新命题所进行的思考。汤亚汀先生这本著作不仅向读者介绍了广阔的城市音乐文化景观,包括文化多元化与时空流动性、经济商业层面与意识形态视角,以及人作为主体与科学技术的关系等;而且以一位学者的身份,从思想的高度审视城市音乐文化研究的学术背景及其发展,同时将其自身对英国东北部的民间音乐生活和上海犹太难民社区的音乐生活所从事的“田野工作”作为研究个案,分别阐述了音乐在不同城市地域中的不同历史文化传统及其现象。

曾是“东方巴黎”的上海是中国近现代音乐文化的摇篮。随着上海正在迈向国际化大都市的行列,它的大都市形象不只是经济意义上的发展态势,而更多包括着文化内涵的城市精神实质,因此,城市的音乐文化发展在其中具有重要的意义。为此,汤亚汀先生在结语中提出了“多景观的联动与互动——上海城市多元音乐文化的重建”。这种建设性的见解无疑将对上海城市音乐文化的健康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

与此同时,一个令人的鼓舞消息,2005年初在上海市政府倡导、上海市教委的支持下,在依托学校上海音乐学院建立了“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它以“音乐人类学研究在中国的发展”为主旨,从三个方面进行建设,即除了“国际语境中的音乐人类学观念和方法研究”、“中国视野中的传统音乐声像行为研究”之外,“上海地域中的城市音乐文化研究”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因此,其正是本着立足上海城市、扎根中国土壤,以国际学界广泛交流的学术环境为整个研究构架,开展各项有关课题研究。我们殷切期待并相信,在这样良好的学术研究的氛围和机遇中,汤亚汀先生和“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的同仁们一定会为中国音乐学术的发展,为上海城市音乐文化研究的开展和深入做出贡献。

[1] 详见洛秦《城市音乐文化与音乐文化产业化》,载于《音乐艺术》2003年第2期,第40页。

城市音乐文化:变化与多元的景观

第一章

引言

现实背景与学术背景

城市音乐生活:场景片段

在杜伦市中心古老的大桥上,几乎每天都见到一个留着大胡子的汉子在演奏小风笛,他用右臂夹着风袋鼓风,手指在管子上压出细细轻柔的旋律。一些过往的行人常常会朝他前面的盒子里投上几枚分币。每周三晚上,他还同另一位演奏者,在桥边小酒馆里作二重奏。

1994年圣诞前夕,笔者在杜伦市中心广场看到一支男声四重唱在演唱圣诞颂歌《贤王温策斯劳斯》,这四个演唱者身着狄更斯时代的长礼服和高礼帽,一旁站着几个女子作为陪衬,也是维多利亚时代的长裙软帽打扮,颇

似狄更斯小说《远大前程》中所描绘的景象。原来这是一个慈善机构在节前的募捐活动。

1995年5月初,恰逢二战欧洲胜利日50周年纪念。那几天简直就是东北地区铜管乐的大展示。工矿企业、大中小学、教会、军队、商店的乐队悉数出动。每天都有几个乐队在杜伦市内各处同时演奏;或在市中心广场由几支乐队轮流表演。市民和旅游者围在四周静听。所奏大多是流行曲,少数改编自经典作品,如埃尔加《威仪堂堂》进行曲第一首。

英格兰杜伦郡兰彻斯特镇的合唱——歌剧社,是一个中老年人的业余音乐社团,成员来自各个教会,既有英国圣公会的,也有卫斯理循道宗教派的,甚至还有罗马天主教会的。作者曾观看了他们以“歌剧之夜”为题的一次演出。曲目比较广泛,包括莫扎特、威尔第、玛斯卡尼、普契尼、比才、拉罗、亨德尔、斯美塔纳、格什温、莱哈尔、奥芬巴赫、萨利文、杰曼等的歌剧——轻歌剧选段。虽然有四个声部,但各声部不平衡,听上去女强男弱,因为男性较少,且多为老者,故女性占优。演出比较正规:伴奏用钢琴,演员穿礼服,每曲之前都由指挥——一位中学校长作简要讲解。观众与演员相互之间很熟悉,音乐会有点朋友之间互相表演观摩的味道。演出票价仅3英镑一张,无法维持开销,故需成员和观众自掏腰包赞助。

——摘自《英国东北部的民间音乐生活》,刊《音乐艺术》1997/2

以上是笔者1994-1995年以国家教委奖学金,在英国杜伦大学研修音乐人类学期间,所见所闻当地城市音乐生活之一斑。对英国东北部杜伦和爱丁堡两城市丰富的城市现实音乐生活的观察和调研,引起了笔者对研究城市音乐文化的兴趣,注意收集这方面的理论资料,并由此引发出应该如何研究我们自己的城市音乐文化——历史的遗产和当今的现实——的一些思考。其实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当时音乐研究所在罗传开先生的领导下已经开始了城市音乐文化研究,那时的课题名称是“上海开埠以来西洋音乐的传入”,而且院里还给以经费支持,可惜没有坚持做下去。后来笔者以20世纪40年代上海犹太难民社区音乐生活为契入点,对这一城市移民飞地作了微型个案研究;同时,也对上海工部局乐队产生

了兴趣,收集资料,试图开展城市音乐文化第二个个案研究。最终目的是以点带面,以若干典型个案勾勒出上海这个城市音乐生活的概况。这恐怕只能是惟一的选择,因为要重建上海的音乐生活史,要全面描述上海现实的音乐生活,必定是一项浩大的工程,非个人所能承担,必须由一个集体的大项目来完成。上海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 2001-2002 年度课题中正好有城市音乐文化这一题目,于是便欣然认领。本书目的是首先提供城市音乐文化研究的理论构架,为今后的相关个案研究打下理论基础。

城市与城市化——现实背景之一

根据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的报告,到 2005 年,世界人口的大多数都将生活在城市,城市自然日益成为音乐活动的中心。(Shelemay, 2001)城市是财富、权力、教育、各种社会群体以及音乐文化赞助制度集中的地方,具体而言,城市里商贾云集,金融与政权机构林立;各种类型与层次的教育机构鳞次栉比,既培养着专业人才,也造就了无数的爱好者;社会群体多元并存——富人与穷人,中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本地人与移民,男性与女性,成年人与青少年——并且互相影响;对音乐文化的赞助则来自企业或政府部门。(Manuel, 2000)

许多城市也是移民的汇聚之地,造成了民族、人种、宗教及文化的多元性,而各个社区的互相交流、影响、混合也造成了文化涵化及各种音乐的杂交,音乐生活跨越社会经济、宗教和民族的界限,活跃在城市生活的公共空间里。(Bohlman, 2002)

当代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化过程的一个方面,固着于现代性中,具有相关的现代主义文化。文化研究涉及到三个概念:内城、后现代城市、全球化城市。

英美现代城市——如底特律——的内城部分地区往往是贫

穷的有色人种居住区,相对于白人中产阶级居住的郊区,这一对立加剧了社会两极分化。当然内城也有中产阶级居住的地段,有基于他们生活方式的文化活动。这样便区分出有色人种和白人、下层阶级和中产阶级的不同文化。

20 世纪最后 25 年出现了所谓的后现代城市,如洛杉矶,在全球化的经济背景下,将城市的经济基础转向高科技、低技能、劳动集中、设计敏感的综合企业。城市经济的重构隐含在新型的社会阶级——种族分隔和两极化之中。廉价劳动力大军的主体是日益增长的移民群体。文化上的特征是如好莱坞和迪斯尼为代表的虚拟现实和流行文化。

全球化城市的概念,来自于少数中心城市主宰城市的世界经济活动这样的含义。此类城市有伦敦、纽约、东京、汉城、洛杉矶、法兰克福、巴黎、新加坡等,它们不是因为人口和企业数量;而是因为关键的人员和活动而成为国际大都市。其特点是:国际资本聚集、分配和流通的地方,信息和决策的功能较之其规模更突出。十个这样的大都会拥有世界 500 强跨国制造业总部的一半,而排在前四位的伦敦、纽约、东京、汉城这四大城市就占有 156 家。(以上见 Barker, 2004: 23-25)

就音乐文化而言,20 世纪末,全球音乐市场已被五大跨国公司主宰,即华纳、贝塔斯曼音乐集团、宝丽金国际集团、百代——维珍、索尼。音乐公司的重新组合为的是在一小批具有战略位置的世界中心城市集中资源。(见第五章)

城市化的概念是指产生大都市区域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活动,涉及将农村转变为城市景观,这是资本主义工业化的特征之一。城市生活是现代性的结果和象征。19 世纪的社会学学者对城市化都有矛盾心理。如杜克海姆希望城市生活是创造、进步、新道德秩序的空间,但又害怕它会成为道德腐朽、精神颓废之地。韦伯认为城市生活是现代工业民主的摇篮,但也产生了工具理性和官

僚机构。马克思认为城市是进步的标志、生产力的飞跃,但也是贫穷和冷漠的地方。城市生活的文化方面的研究,涉及阶级、家庭、生活方式和族群性。城市提供了无可比拟的就业和娱乐的机会以及社交和文化活动的机会:听音乐,看电影,上馆子,逛马路,购置时装及化妆品,等等。(Barker, 2004: 204-205)

城市化,尤其是新兴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城市人口、现代技术及大众媒体的迅速膨胀,对20世纪文化和社会结构影响的深度和广度是空前的:稠密的人口和现金交易,大众娱乐新形式从卡拉OK到MP3网络音乐的发展,以流行音乐为主体的商业化的音乐工业,及其无处不在的音乐产品和大众媒介产品的市场,更重要的是城市居民每天接触到五花八门的意识形态、音乐风格和媒体话语,产生着多元的社会认同、审美意识以及文化融合的体裁。(Manuel, 2000)

还有所谓的“第二次城市化”,即城市变成多元文化中心的过程,美国音乐人类学家内特尔有如下论述,并以世界一些大城市为例:

“第二次城市化”即是作为某一特定文化中心的城市如何变成多元文化的中心;或从一开始就是多元文化的城市中心(如差不多是在20世纪发展起来的某些非洲城市)是如何确立起来的。虽然肯定有些欧洲城市——如维也纳、伦敦和伊斯坦布尔——曾经并继续履行多种文化功能,并在20世纪前夕聚集了若干原本会是独立的社会;但城市快速发展,联合起来作为各社会群体对峙的地点(这些群体有近期来自国外的或来自农村的移民),则基本上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现象。最特别的城市如墨西哥市,其巨大发展是内地人口涌入的结果;又如拉各斯,是由构成尼日利亚国家的几个少数民族群体同来自西非其他地方的劳动者以及欧洲人结合而成的;底特律,19—20世纪之交经历了南方高原白人贫农、前南方邦联各州农村及种植园黑人、欧洲尤其是东欧国家许多移民的涌入。所有这些少数民族群体都曾部分地保持过独立,同时相互之间又确立了冲突、合作与交流的关系;每个群体内部往往又再分出几个部分,不同程度地信守昔日的习俗与价值观。(Nettl, 1991)

全球化, 西方影响与文化一体化——现实背景之二

全球化的概念是指日益增长的多方向的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联系, 这些联系跨越全世界也跨越我们对这些联系的意识。全球化不仅是经济问题, 也关注文化意义的问题。虽然依附于地域的价值观和意义仍旧重要, 但我们日益卷入超越我们直接具体位置的全球网络之中。我们不是世界国家(world-state)或统一的世界文化的一分子, 但我们能够识别独立于国家关系的全球文化过程——即文化整合与分解的过程。尤其是, 随着可以接触多样而遥远的文化, 世界主义成为西方日常生活的一个方面, 通过电视、广播、超市、购物中心而成为符号和商品。而且, 殖民主义及其后时代所确立的人口运动和定居的格局, 加上最近加速的全球化, 尤其是电子通讯, 增加了文化并存、相遇、混合的可能性。

当然, 在文化的层面上, 全球化的特征是金钱、技术、媒介、思想与人口等流动之间的分离关系(如同本书所借用的阿帕杜莱的五个景观——引者注)。即全球化涉及族群、技术、金融交易、媒介形象、意识形态冲突等的动态运动, 这些流动的速度、范围, 影响是断裂的、分离的。不确定性、偶然性、混乱, 正在取代秩序、稳定性、系统性。全球化和全球文化流动, 不能通过整套的单一线性决定因素而要作为一系列重叠、多种因素、复杂、混乱的条件来理解。(以上见 Barker, 2004: 76-77)

全球化必然带来第三世界的城市化进程中一个最常见的因素——西方的影响。正是这一影响促成并推进了这一进程。欧洲自19世纪初工业革命以来, 以其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为后盾, 开始了对全世界的扩张, 将西方的技术、经济体制、政治体制乃至意识形态和文化艺术, 推行到世界各弱势民族, 形成了一种“全球工业文化”, 即以西方价值观为楷模的全球文化一体化。而近年来

的全球经济一体化也强化了这一全球文化一体化的进程,形成所谓的文化“全球村”现象。就音乐文化而言,无论是当初随着西方资本输出、殖民、传教、军事入侵而来的西方古典(或艺术)音乐,还是今天借助音乐工业、跨国公司、大众媒体(电视、广播、音像产品、因特网)而风靡各国的西方流行音乐,都是文化一体化这棵大树上结出的果实。这两颗果实还留下了它们变异的种子,即用西方作曲技法、西方乐器表现各国音乐的“民族乐派”(这里借用19世纪西方音乐史中的这一名称),以及用西方和声、摇滚节奏、电声乐器、电子合成器等表现手法的各国流行音乐,后者虽也借用“世界音乐”这一名称,但却是西方化包装的世界流行音乐,是西方音乐工业的新产品,跨国唱片公司的新卖点。西方流行音乐及世界流行音乐,都是当今“工业跨文化”(industrial interculture)的产物(Slobin, 1992)。再套用美国音乐人类学家斯罗宾的术语,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无可争议的现实是:西方音乐这种强势文化已成为一种国际(或世界)“主宰文化”(superculture),而各国传统音乐这样的弱势文化则成了国际上的“亚文化”(subculture)。

然而“当今全球互动的中心问题是文化同质化(一体化)与文化异质化(多元化)之间的冲突”(Appadurai, 1990:5)。全球经济一体化,却带来了世界政治多极化的局面,在许多国家出现了民族认同、文化认同的潮流,即寻求自己民族、文化的标识,以证明自身存在的价值,不至于为经济一体化的潮流吞没而成为大国强权的附庸。在这一认同的潮流中,人们发现音乐是一种很有特色的标识。

城市音乐人类学——学术背景之一

有趣的是,历史音乐学历来一直全力进行城市研究,但却并

不经常声明这一方法。(因城市一直是西方作曲家、表演家活动的中心,故历史音乐学一直以城市为其背景)(Shelemy, 2000)历史音乐学研究城市,也将其作为传统延续的单元,涉及城市机构,如学校、教堂、宫廷、音乐厅、音乐家社团在发展传统中的作用。(Nettl, 1978)这方面也是音乐社会学研究的内容。

音乐人类学则长期专注于农村而忽视城市,主要研究民间、乃至原始部落的音乐。即使涉及城市,也主要专注于城市飞地怎样保存了道地的农村传统或古代宫廷音乐。60年代以来逐渐有了城市研究,研究民间音乐的城市化问题,如北美城市背景中的布鲁斯(如《城市布鲁斯》: Keil, 1966)和爵士乐、以及城市化的移民间乐团;同时也有研究非洲城市音乐、当地音乐家以及结合非洲传统和西方因素的流行音乐的。(Nettl, 1978)

面对城市音乐文化的急速发展和城市各族群日益受到现代西方音乐文化的影响,“音乐人类学家近来想撤出在孤立的农村‘田野’工作,加之分支学科城市人类学的发展,这一切都激励我们的领域开始全力以赴地研究城市环境。这种新的倾向同接受流行音乐为合法的研究有很大关系,但也离不开对游离于各文化间、各民族间、各社会背景间的移民及其音乐日益增长的兴趣。”(Nettl, 1991) 于是一门分支学科城市音乐人类学(urban ethnomusicology, 或译作城市民族音乐学)便应运而生。

关于这门学科的研究范围,内特尔早在1978年的专著《八城市音乐文化:传统与变化》中明确指出过,即是:亚非及美洲国家现代城市中传统音乐的命运;在向现代(基本上是西方化的)城市生活变化过程中,传统音乐文化所起的作用;传统音乐文化与西方音乐文化的相互影响(包括音乐风格和音响,涉及文化背景及人的行为);各个社会阶层的音乐,有古典、民间和流行音乐等,以及这些音乐之间的相互影响及比较研究,还涉及各种文化中对其多样化音乐的分类;研究分析——并以城市音乐民族志记录——

城市音乐生活、音乐产品及其生产者、消费者和音乐行为;以及一些实用的问题,如面临现代化如何维持传统,城市学校的音乐教育等。

该学科研究的中心问题之一是西方影响。内特尔将这一影响划分为“西方化”和“现代化”。“西方化”是指将传统音乐改变为西方音乐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即采用西方的乐器、和声、记谱,受西方影响的旋律、节奏、音准、发声法,以及其他音乐结构和行为参数。“现代化”是指,虽然也采纳了一些西方因素,但保留了传统的本质,成为当代世界及其各种价值体系中的一员。这两种变化都产生了音乐风格和文化中西方因素和传统因素的混合。还有一种混合介于两者之间,即文化融合(syncretism),指两种文化中相似或亲和的因素的结合,由此形成一种新风格。流行音乐是上述各种混合的最突出的领域。有时甚至是多种文化的混合。连欧美流行音乐都加入了这一潮流,如结合了西方古典、民间、美国黑人(甚至非洲)和拉美等多种因素。

内特尔在其后两部著作中,进一步论述了西方影响之下全球音乐变化的类型和规律以及反应类型(1983),西方对各大洲音乐的影响以及全球对西方影响的反应的规律(1985)。1991年他又作了重要补充:

音乐人类学的目的是调查这些群体如何使用音乐达到自己的目的,其音乐风格和曲目、音乐行为、以及关于音乐本质和功能的思想,如何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发生变化。主要有三种研究,即:农村民间音乐(主要是欧洲的)被带到城市后的命运;亚洲古典音乐在现代化的城市环境中的命运;流行音乐体裁从其他现存的音乐风格和体裁的结合中的确立。一般性理论的文章不多,但发表了一定数量的关于方法论,尤其是关于田野工作方法和阐释的文章。在进行这些研究时,音乐人类学学者尤其意识到了音乐作为文化标志的重要性,即作为一个族群用以表达自己区别于他群体的独特性的东西,用以实现群体聚合,但也用作不同文化间交流的手段。至于音乐如何受整个城

市环境的影响,上述这些学者尚未得出一般结论,但是已研究了这种环境中某些组成部分的影响,如流行音乐的发展、媒体的影响、不同文化群体间的密切关系和对立、专业化的发展。对城市文化日益增长的兴趣,加强了几十年来令音乐人类学学者着迷的上述问题。

城市音乐人类学 90 年代继续发展,有许多方面已涉及到后现代理论。内特尔的高足波尔曼(Bohlman, 1991)在《世界音乐揽胜》一书中以欧洲城市——尤其是维也纳为例,作了理论概括,主要如:维也纳音乐的特征表现为传统性(大音乐家的曲目)、边缘性(外来音乐家)和多元性(多民族和多种类);音乐会是城市音乐的产物,这一表演形式强调音乐本身,终止民间或宗教仪式和社会行为,同时却产生自己的仪式(服装要求、程序、批评式鉴赏),也是产生专业化的明星及其炫技神话的场所。此书其余各章论述某一地区音乐时,也各以一个城市为例,如加尔各答、德黑兰、上海、东京、芝加哥、匹茨堡等。此外,关于非西方城市音乐研究中的佼佼者,如沃特曼对尼日利亚伊巴丹流行的“居居”乐的研究(Waterman, 1990),图里诺对秘鲁利马的内地移民音乐研究(Turino, 1993)

斯洛宾(1992)进一步从西方社会中的移民亚文化音乐来探讨城市音乐,提出一系列理论框架:亚文化(subculture)同主宰文化(superculture)、跨文化(cross-culture)的关系;大众文化研究中对全球文化经济的景观研究体系,即人口景观、技术景观、经济景观、传媒景观、意识形态景观(Appadurai, 1990);阶级、族群性、社会性别、年龄等后现代参数;亚文化活动的三个领域(选择、亲和、归属);亚文化的运转模式等。

随着研究城市中不同的少数民族群的音乐传统,人们开始承认:1)国内存在着多元性的文化(即斯洛宾所谓的亚文化);2)存在着跨族群、跨社会——经济、跨不同世代的通俗音乐和媒体音乐(即斯洛宾所谓的工业跨文化);3)所有这些传统相互存在关系